

# 南充回眸

## ——关于胡耀邦同志的记忆

周明

南充是我多年向往的地方。缘由有二：一是因为它是地处嘉陵江中游的一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二它是朱德元帅的故里，又是胡耀邦同志工作过的革命老区。

庚寅炎夏七月，我才得以初识南充，踏上这片热土。可惜因为夏雨绵绵，朱德故里未能成行。我和朋友们便沿着胡耀邦同志当年在南充工作的足迹，去西华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看看那时的川北行署办公大楼、川北区行署礼堂和胡耀邦同志后来题名的北湖公园、张澜纪念馆、南充市青少年宫以及他当年高瞻远瞩规划建设的一条宽阔的人民东路、人民南路、人民北路和人民中路……难怪漫漫六十年后的今天，南充人谈起胡耀邦同志，依旧是充满怀念之情，感激之情。

南充是胡耀邦同志解放后第一处工作地。时间是一九五〇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八百七十七天。他由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岗位调任南充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区行署主任之职。当时，刚刚解放的川北，民不聊生，百废待兴，工作困难重重。但是耀邦同志凭着他的智慧和力量，很快打开局面，开展各项工作。两年间，他把一个人口不足三万，面积仅1.5平方公里的小县城南充，扩展为面积达三平方公里、人口达五万的昌盛起来的中等都市。这，凝聚着耀邦同志多少心血和辛劳啊！

走进当年的川北行署大楼，我急切地想看看胡耀邦同志的办公室。这是一间普通的房间，陈设简单。他在这里处理繁忙的日常事务，诸如开会、谈话、批阅公文等等。听说下班后这间屋子里的灯光总是亮着，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勤勉工作。

听说，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一周年的今年四月十五日，南充市当年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过和接触过他的一些健在的人有许多珍贵的回忆。当年的川北行署办公



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故居

厅副主任黄天祥回忆说，一九五二年，在南充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回族代表马腾九批评人民政府不重视民族工作，在讨论施政方针上没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霎时全场哑然。因为多数人的发言赞扬居多。这时，胡耀邦同志却站起身带头鼓掌，表示诚恳接受马腾九先生的意见。他说，在南充虽然少数民族数量不多，但不注意团结各民族关系是个缺点。他特地安排马腾九担任了行署少数民族机构的负责工作。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广。

还有当年在川北日报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的萧也牧回忆说，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他下乡采访，在一次村民大会上，看到翻身农民领到土地证时，激动地即兴说出了一首诗：“土地和红旗，今天见到你，多谢共产党，感激毛主席。”他觉得这首诗很好，便登在了《川北日报》上。不料被胡耀邦看到，过了几天，耀邦同志顺路来到报社，同萧也牧亲切交谈起来，说：“我听说《土地和红旗》那首诗是一位老农民即兴说出来的。你们把它发在报纸上，这很好。”他说：“报纸的文艺副刊，以后要尽量多发一些来自翻身农民弟兄心灵深处的肺腑之言。作

为编副刊的文艺编辑，也应该经常深入农村，多和农民交朋友，才能进一步把副刊办成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胡耀邦同志这番话语重心长，萧也牧铭记在心，深受鼓舞，在此后的工作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和贡献。

类似的故事，在南充流传很多，也很广。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深为感动。

这时，站在胡耀邦同志工作和生活过的南充土地上，我突然间想起在北京拜访胡耀邦同志的情景。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期间，一个初夏的黄昏，我如约踏进北京东城一棵大树掩映的富强胡同六号。院子里绿树葱茏，花朵盛开，十分安静。我进屋时是晚上七点，只见胡耀邦同志正在看“新闻联播”，他用手一指客厅的椅子，招呼我说：你先生，我看完电视，招待客人喝茶用的茶杯，上面有北京棉纺厂的红字印记，这显然是夫人李昭同志的。当时李昭同志担任北京棉纺厂的领导。室内的家具和摆设都极为朴素、简单、实用。突然，我见耀邦同志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新出版的《人民文学》，我很高兴，但又想，胡耀邦同志工作那么忙碌，还关照着刊物。

他看完“新闻联播”，转过身和我交谈起来。他首先说：习惯了，也是工作，看新闻联播。我没有想到，作为我辈敬重和仰视的领导人胡耀邦同志是那么的和蔼、平易近人亲切！

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刊物工作谈起。耀邦同志说：《人民文学》办得不错，你们扶持了一批新人，发表了有突破性的好作品，读者就愿意看，就会有社会影响。我说：批评性的报告文学总有人不高兴，指责我们。他说，有些文学作品尖锐点，只要你们坚持实事求是，内容真实，就站得住。谈话间，他关切地询问一些他所熟悉的作家状况。他问王蒙、邓友梅，问刘宾雁、从维熙、刘绍棠他们正在写什么？在哪里深入生活？我根据所知向他作了汇报，他感到很欣慰，不断点头称道。然后他颇为感慨地坦率地说：他们几个人都是很有才华的作家，年轻时就已写了那么多好作品！后来一九五七年反右，错划了他们。我当时在团中央，也有责任啊！他说：现在改正了他们的问题，他们也都会回北京了，这就好！我看他们复出后精神状态不错，一个一个都发表了作品，再次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聆听这一席话，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对胡耀邦同志更加敬仰！当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在北京逝世后，人们都无比悲痛，用各种形式向他致哀。当时，我和陶斯亮、理由、南宁怀着沉痛的心情去献上花圈。刘宾雁同志正在美国访问，我们知道他给耀邦同志的感情，花圈上也署了他的名字。不几天后，我恰好去美国访问，在旧金山见到刘宾雁，对他说明此事，他特别感谢朋友们，说这正是他的心意。还直说，太可惜了，耀邦同志走得早了！

……是啊，胡耀邦同志走得早了！然而，他虽人已去，他的思想、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

兆和：

天气转冷，又落长雨，你们在住处搞学习，也一定还是极忙。我们到这儿的情况，大致比上次初到十连或稍“狼狈”些。上次信想早收到。目前还暂住区革委会空楼上一空房子里。亏得这边同志热情接待，用极短时间把行李移入仓库，又在住房临时用三张席子，连缀成一个临时墙壁，牵了个电灯，三个人便在灰尘稍厚的稻草上摊开地铺，住下来了。各人小竹椅全入了库，因此终日都离不开地铺，不易适应。体力难活动。晚上七、八、九点钟都有高音喇叭在五丈内外广播。又正值区里二千人干部大会，会场经常就在楼下，日夜进行，一次必三四个小时。若得听懂话，说的大致多是二三年两条路线事情，说得多极兴奋激昂，一定可增加许多有用知识，可惜听不懂。吃饭取水已不必离开房子，只是大小便都得到屋外公厕，路比原“四五二高地”远一倍，遇雨天晚上外出，不免有些麻烦。特别是上下两段楼梯过陡，每次谁下去，另外几人都要嘱咐“小心”。日常伙食已较好，因为人少，比较好办。早上市里有大油条，一两粮票六分钱，即作一顿早餐。晚上电灯到十二点才熄，不能关闭。

双溪区小平原到处是小村落，一般都是大砖瓦屋。田地平整，大小田坎也极平整，只一二种细草草在田坎边，别无杂草，因此到处都十分干净。大小小孩衣着也都干净。孩子眼目明亮。溪水多沿村流去，比龙街子前水大得多。随时有人钓鱼，水塘捕鱼必得百斤。这山日用品也较多，主顾却不多。因为是个富庶区，猪多大到二三百斤，已有较多极好看大黄牛，鸡大到三五斤重，素菜品种多而好。医院在附近高地，药物齐全，看病方便。就环境说，向阳湖大不相同。向阳是“拓荒区”，荆棘丛生。这里是“成熟农业区”。听说矿山近山，水石更清秀，建筑民房就比向阳好得多。土地好，即雨季也不至如向阳烂泥一团。树有梧桐、楠竹、松、杉、和一般所谓江南风光已极相近。因此人夏或许也比向阳区好些，不至为蚊子和长虫威胁。特别是用水便利，地无杂草，随地可以坐坐，有点近于昆明后山。料想不到和向阳只隔百里，差别就如此大。

我大约因为累了些，和新生活新的适应力已较差。最近一星期血压高到二百卅——五十，低的已百卅。打过硫酸镁二次，还是在稍降后又上升。住处略具“难民”形象，心情实并不消沉。只是血压和心脏问题，都比较具体，得想法对付。同行张同志是我们组长，一再建议改住医院，医院中人大致也和这里文化部指挥处商研过，同意我去住院，因为别无办法，至少可以安静多睡几小时，且到区大会结束后再看。传闻得到月底才结束，我因为住医院还得每天到区里大厨房取饭、取水，太不方便。张虽极力赞同我住，并为我送饭，我还是不去。主要就是吃得太麻烦人，医院人多去学习，只一医生一护

士在，不好意思，希望过三几天能降到二百、一百十，就可望继续维持下来了。

我并不觉得什么特别难受，只是食量又下降到一天五两粮食以下。一面反映体力活动过少，一面也反映目前生活方式成问题。这么持久下去显然是不成功的。张同志怕我突然出事故，曾说过是否调你来好些？同是工作，这里也有的是杂活可做。你也可以把你的打算告诉我。我想到的是你和五连同志共事已十多年，“干生不如一熟”，人熟，长处明白，不仅工作在相互鼓励帮助下，容易搞得顺利，且不至于有不必要摩擦。比如在那边，大家明白你体力受年龄限制，分派工作，



沈从文与张兆和

生说话直爽，告我不仅左心室不良（病历上有），右心室也不大好。一定要安静躺下才好。可是我眼下到的却是个什么热闹地方！由于扩音器好，这里二千人的会，就比廿年前在四川参加万人大会还热闹得多。我由于怕累别人，总想方设法给人打气，可是血压和心脏却不听自己调度，并且难于适应新的种种生活。

这里一下雨，就不便出门，报也见不到。还是把你旧报寄来吧。三五天或一星期寄一次都成。多少总可从报上多明白点国内外事情况。雨时房中相当阴暗，虽直到屋后大厨房去取饭，可不沾雨，屋里到处还是湿湿的。雨季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更加湿。天气一变，手足都上了冻，楼上升了火，缩在被窝里看书，也感到困难。但想想几千人如何在日夜奋斗，个人就毫不足道了。

小街拐角处照例每天都有十多人卖各种素菜，是自由市场货，我们可绝不能买。但将来搬到小学自己开伙时，如何买素菜，倒是个问题。因为肉食即或有供应，素菜似乎还到不了市场。只有公共机构上千斤买卖，还少见有人三五斤去买。总之，开门七件事中的一、二、三、四，都得转户口才能办。三户都是未定户，不好办。且闻十连大厨不久就得撤除，或移过工地，到时我们即仍住楼上或者迁过小学，面对现实种种，都得想法克服，不怎么办好。

吉人天相，诸事放心，不可免有种种矛盾，到时自会解决的。大弟等有信转给我看看。曾给过他们各一信。

从文  
一九七〇年 二月二十日  
附注：作者等三户老、弱、病职工，1969年冬来到咸宁。由于本单位没有其他人下来，暂无组织归属。曾在向阳湖“四五二高地”文化部“五七”干校一指挥部临时安置了两个月。后又来到双溪，蒙双溪地方同志和故宫博物院下放的下连同志收容接待，在这里度过了二年半难忘的生活。这封信是作者刚到双溪几天后，给在向阳湖劳动的妻子报告新环境的第三封家书。  
(摘自《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

# 致张兆和的信

沈从文  
双溪书简

能比较实事求是。这里大家陌生，工作若一律拉平，你怕担负不下。所以我还主观地想，与其让你来一陌生的地方为难，还不如再得半年下去，到你们可分配房子时，我作为你家属，请求来向阳，同分苦乐，好一些。至于目前的困难，个人总还是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要大弟或小弟回来收拾一下残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经验，并且有个家，明白什么需要就拿走，用不着的，就分散给同事中较困难的。你能留在五连，我相信同志们对你一定会照顾，生活得上好。若一时退休，请求过虎虎处，也一定好办。

我说这些不是意志消沉，到了这里，绝对不会消沉。正是正视现实，提提恐来不及说到的问题。我已两三次轻微发昏，和上年在医院中那次昏倒相近。征象不大好。低血压到百廿即不好受，百卅就好些。要正视这个。因为年纪究竟已近七十岁。遇事乐观是应当的，受自然规律限制也得认可。能在较近迁定一个住处，有可能会转好一些。年轻医

# 萧也牧：做《红旗谱》责编是一种“高级的创作”

石湾

如今，人们习惯把“文革”前诞生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称之为红色经典。而在红色经典中，开风气之先的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日》和《红旗谱》。《红旗谱》虽比《红日》晚出版几个月，但这部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重要地位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

那是一九五四年，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正由出版翻译作品向出版创作作品战略转移，走出去向作家广泛约稿。萧也牧听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张云芳说，文讲所支部书记梁斌悄悄写了部关于高蠡暴动的长篇小说。张云芳和萧也牧是晋察冀群众剧社时的战友，她的丈夫潘之汀就在文讲所工作。萧也牧征得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同意后，就和编辑张羽一起，去文讲所找梁斌，把《红旗谱》初稿抱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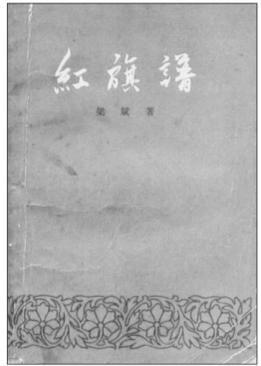
在作家云集的文讲所，起初谁也没想到这位专职的党支部书记，正在写着一部皇皇巨著，即便是看了《红旗谱》部分初稿的人，也没一个予以褒奖的，更没有哪家出版社上门来争抢这个旧皮包里的“红宝石”。黄伊在《编辑要有伯乐的眼力》一文中回忆萧也牧审稿时的情景：“取回稿件，他关起门来，细细审读《红旗谱》原稿。看了稿件，他兴奋得不得了，给作家打电话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但是，毕竟梁斌在战争年代长期担任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不是专业作家，驾驭这样的重大题材，写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初稿离出版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萧也牧和张羽把《红旗谱》初稿送回梁斌时，详细谈了他们的审读意见，明确表示，稿子基础不错，已列入中青社的重点书稿，希望他认真加以修改、充实，使之成为一部“能一炮打响的杰作”。

萧也牧和张羽的鼓励，使梁斌信心倍增。为了将《红旗谱》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他毅然决定辞去文讲所支部书记的职务，回故乡河北去。为此，他求助于在华北局组织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陈鹏。未料陈鹏说：“你还是到天津去吧，可安排你当副市长。”梁斌回答：“我不想做官，也没有意思当副市长。”经过一番周折，一九五五年三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的名，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旗谱》的写作。经过半年的奋战，他将《红旗谱》改出了一稿。张羽、萧也牧先后审读之后，由张羽执笔，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名义，给梁斌写了一封一千五百字的信，对书稿作了概括的肯定，并提出两条意见：“作品还写得粗糙，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作品中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此外，还强调“作品中所写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动，哪些应该肯定，哪些需要批判，有必要明确指出”；“也因为它是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将会在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和你都应认真的心情来对待它。……除了请河北党委审查外，还有必要请中央审查”。十一月十二日，梁斌在复信中表示：“感谢你们尊重我的劳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出版前要送中央及作家协会审查一下。”并说：“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红旗谱》，约二十七万字。第二部《七月》约二十四万字。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更好一点。”

为了节省梁斌的时间，一九五六年春末，萧也牧专程去保定审看《红旗谱》。看完之后，他兴奋地对梁斌说：“诗，这是史诗，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定额……”并与梁斌正式签了约稿合同。江晓天对《红旗谱》这部重点书稿的

编辑工作抓得很紧。梁斌在一九五六年底交稿之后，江晓天考虑到萧也牧是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对《红旗谱》所写的高蠡农民运动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就决定由他来当责任编辑。应该说，由萧也牧来当《红旗谱》的责编，不仅是梁斌的幸运，而且，对于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当年与萧也牧坐对桌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萧也牧老师》一文中：“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决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方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做着文字的加工和润色。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

书稿编就发排后，萧也牧曾拿着大样，找了几家刊物，想争取在出书前选发几章，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在付印前改得更好一些。结果，他很失望地对江晓天说：“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就是难啊！算了吧，干脆咱们直接出书。”于是，他就要求出版部想办法打扮《红旗谱》，给它出大开本、黄胃的插图本、精装本，乃至送到莱比锡去参加国际博览会的道林纸特藏本。连第一版封面上的书名题字，也是出自萧也牧的手笔。这就表明，假如不是有萧也牧这样一位殚精竭虑、认真细致的责任编辑，《红旗谱》的艺术成就未必会如此伟大，在文学出版史的地位也未必会如此崇高！正如江晓天在《“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一文所说：“《红旗谱》是中青社开创后，出版的第一部引起广泛注意的创作长篇小说，给编辑工作提



供了许多重要经验……回想起来，当年一些作家听说萧也牧改行当编辑，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大概就是因为他的搞过创作，对作家冀望于编辑的是什么呢，有切身的感受。”

萧也牧曾说过：“编辑是作家的朋友，同时是作家的学生也是老师。他要真正能够对作家有所帮助。他应该是一个高明的艺术品的鉴赏家。他应该是伯乐。他为人们发现一个作家，他的贡献，并不亚于发现一个矿藏。他应该是一个严格的文学评论家。‘编辑是高级的创作’，他要担当得起这样的称号，必须努力学习，使得自己的生活知识和对生活的理解，自己的文学知识和对文学的理解，不致低于作家的水平。他要善于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来鉴赏作品。他要善于根据创作劳动的特点来进行编辑工作……”

《红旗谱》在一九五七年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应该是作者和编者都感到分外高兴的事，相互间的情谊也无疑会因合作的成功而变得更加亲密与深厚。然而，事与愿违，当萧也牧随后登门取《红旗谱》的第二部《北方的风暴》(后改名《播火记》)的原稿时，梁斌却没有答应。回社后，萧也牧又给梁斌打

电话。黄伊在《〈红旗谱〉失而复得》一文中写道：“萧也牧本名吴小武，他打电话给梁斌时自我介绍：‘我是吴小武……’作家听说是他，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河北人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你呀……’呱嗒一声把电话挂断了。作家一怒之下，不但收回《红旗谱》的版权，而且将该书的续集《播火记》，也统统转交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了。在此前后，经中宣部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用编本的名义，也出版了《红旗谱》。”(《编辑的故事》第九十六页)

那么，究竟是为何事，萧也牧没有为梁斌“两肋插刀”呢？稿费！梁斌在《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提到一九五六年春萧也牧去保定签出版合同时，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拍拍我的肩，说：“梁斌同志，了不起呀！我们的大作家！”立刻从皮包里掏出合同，叫我签字，我根据他的意见签了名。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定额是他自己填的。

送走了客人，走回我的小屋坐下来，平了平气，这时我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

(《梁斌全集》第五卷第四百九十四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

千字十八元的稿费标准低吗？不低。他签字后是“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据黄伊回忆说：“在五十年代，付给作者稿费有两个规定：一，根据稿件质量，千字付多少稿费，十二元、十元、八元、

六元不等。二，印数定额，五千、一万、两万、五万、十万不等。印够这个定额，就付一次稿费。定额一般由出版社掌握，最好保证作家能拿两次稿费。”据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的记载：“《红旗谱》出书，给了四万元稿费，交帕英(即梁斌夫人——笔者注)保存。七个子女，自此生活有了保证。”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红旗谱》累计印了二百一十八万册，如果以三万册一个定额计，梁斌至少可得七十万元稿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物价水平很低，一般国家干部的月薪不足百元，《红旗谱》首印就得四万元稿费，这在当年，就应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怎能说萧也牧没有为梁斌“两肋插刀”呢？再说了，萧也牧为《红旗谱》付出了那么多才智和辛劳，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回报和赞赏啊！

《红旗谱》的版权丢了，作为编辑室主任的江晓天当然于心不甘。他想去张羽去挽回颓局，未想到张羽打电话给梁斌，梁斌接来一句气话：“不接！”梁斌不接张羽的电话，江晓天决定再换马，派黄伊专程赴天津到他家来修补篱笆。梁斌见黄伊登门来看望他，就知道中青社是要收回《红旗谱》的版权，便说：“百花文艺出版社不但重印了《红旗谱》，连《播火记》也排出来了，他们肯还给你们吗？”黄伊说：“只要你同意将《红

旗谱》和正在排印的《播火记》交还中青社，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黄伊离开梁斌家就直奔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家驹家拜访。林家驹很大度，当即同意将《红旗谱》的版权还给中青社，同时，他好人做到底，将正在排印的《播火记》一并转让。黄伊也当即表示，百花社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全由中青社来理单。于是黄伊就成了《红旗谱》再版和《播火记》及第三部《烽烟图》的责任编辑。江晓天对我说，黄伊是一个热心为作家服务的好编辑，腿脚勤快，组稿能力特别强，但是，文学功底和对稿件的修改加工能力比萧也牧要逊色得多。我明白了：《播火记》、《烽烟图》出版后之所以远不如《红旗谱》的反响大，就是因为作为责编的黄伊不能像萧也牧那样，通过殚精竭虑、字斟句酌地精心加工润色，使作品的艺术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据黄伊生前讲，粉碎“四人帮”后，梁斌听他讲述了萧也牧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后，曾不胜唏嘘，含着泪说：“没想到萧也牧比我还惨！我不该那样误解他呀！”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公开为萧也牧平反昭雪后，包括王蒙、秦兆阳、康濯、流沙河、浩然在内的许多著名作家和编辑朋友都为萧也牧写了极其感人的怀念文章。可是，我们在《梁斌文集》里，却找不到一篇怀念萧也牧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